

1982

史文岡佛

第四輯



佛岡政協文史組編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

目 录

- 一、《佛冈农民报》创办始末 洪 流 (1)
- 二、浮云游子意 沧桑话乡情 黄敬文 (8)
- 三、我县第一任书记邹北珍 张仕林 (17)
- 四、青竹武装斗争与分田 朱腾洲 (27)
- 五、威震敌胆 气壮山河
——记桂牌迳大捷纪念碑及“挂牌之战”
简介 廖柏昭 (34)
- 六、“青年党救国军”反革命暴乱始末 关 邑 (38)
- 七、日寇到府城 四人遭惨死 钟慧星 (43)
- 八、日本侵略军在石角的屠杀暴行 廖柏昭 (45)
- 九、难忘的汤塘“八·二八”惨案 周万安 (47)
- 十、我县屈原式的人物——欧阳晖

- 郑中品 (50)
十一、佛冈说古话移民
..... 钟神永供稿 阿水整理 (53)
十二、漫话三爱亭 郑国象 (58)
十三、契~~也~~茶——“仙水”
..... 廖凤仪搜集 (61)
十四、迳头今昔观感 朱如袁 (64)
十五、迳头区甲名名胜琐记 朱如袁 (67)
十六、佛冈县民国时期历届县长花名册
..... 郑中品整理 (71)
十七、《佛冈十景》报导中的两处讹误
..... 李 镇 (76)
十八、古篆刻(木刻) 邓文锦 (79)
插页 《佛冈农民报》创刊号及征订广告

《佛冈农民报》创办始末

洪 流

《佛冈农民报》是中共佛冈县委员会机关报。创刊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一日，终刊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十日，历时四年零八个月，共出版报纸一千零十七张，约一千四百一十万字。是佛冈县有史以来第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。

报纸创刊初期叫《佛冈农民报》，为三日刊，版面四开两版，每期七千字；后改名为《佛冈报》，四开四版，每期一万五千字；一九五八年冬佛冈与从化合并为一个县后，《佛冈农民报》与《从化农民报》同时合并，改名《从化日报》。发行份数从初期的三千份增加至一万份。曾被佛山地区评为先进县报。

在《佛冈农民报》诞生之前，省里办有《南方日报》和《羊城晚报》，各地区都办有农民报，在粤北叫《粤北农民报》。一九五六

年春，广东省委学习外省创办县报的经验，认为各县办报纸好处多，于是决定停办地区农民报，作出《关于创办县报的决定》发送各市地县委。粤北区党委于三月间举办县报编辑人员训练班，培训各县办报骨干，并将《粤北农民报》编辑记者分派各县增强办报力量。

《佛冈农民报》的任务，是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以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农民群众，动员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逐步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，发展农业生产，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，巩固工农联盟，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、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！

报纸的编幅虽然不大，然而内容却也丰富多彩，有报道国家建设，宣传党的各项政策，讲解时事新闻，也有反映农村生活，介绍新人新事，表彰先进人物，交流生产经验，解答各种疑难问题，帮助农民学习，提高大众文化，开展批评建议，指导农村工作。版面除刊登国内外大事和本地新闻外，还根据党在农村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，发表评论性文章，文学性通讯，讽刺性小品和文艺作品等。与此同时，还开辟有

“知心话”、“要紧话”、“三日谈”、“大家谈”、“小谈天下事”和“当前问题”等通俗性栏目，文章短小精悍，为群众喜见乐闻。并开设“文化生活”、“农村俱乐部”、“石角河畔”和“红花”等文艺副刊，刊登诗词、山歌、唱演资料、小故事和“小小说”等文艺作品。版面还配合照片和插图，做到文图并茂，生动活泼。

在与从化并县之前，报社工作人员很精练，有：副总编辑洪书昭（洪流），编辑记者赵忠文（帆影）、谢彬权（奔泉）、伍尚洲（小川）、李杰之（伐坛）、杨强生（杨树，借用广播站人员），还有收录新华社新闻、处理读者来信和发稿费，初为温汝清（景清），后为吴诗龙。与从化并县后，报社工作人员增加至十九人。

党报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，要反映群众的呼声，所以它除了贯彻“全党办报”的方针外，还紧密依靠群众、发动广大读者共同办好报纸。于是，编辑部组织发展三百多名通讯员和特约记者，作为报社的骨干力量。他们经常给报社写稿和反映情况，协助组织读报组。县

委、县政府和各科局领导同志中，有许多人经常积极为报社撰稿，如陈基、李镇、冯灼锋、何育铮、黄忠和、黄甘毛等，县、区（公社）、乡（大队）干部也有不少是积极通讯员，如殷展威、陈金铨、谭观培、钟明佳、熊子标、徐焕通、陆光林、刘恩松、陈社铭、何久发、李得华等。

许多乡（大队）、村（生产队）还组织起读报组，经常在农民群众中进行读报；各地业余农民夜校、识字班也常用农民报作为学习的教材。

为了帮助通讯员提高写作水平和交流读报经验，编辑部还编印出版一个内部刊物《通讯与读报》，供通讯员和读报组学习之用。

办报初期，印刷条件很困难，在此之前，佛冈没有一间印刷厂，后来清远迁来一间私营的“时记印刷厂”（即现在佛冈印刷厂的前身，老板马湘），设备简陋，但可勉强应付。后来公私合营，县委派县总工会干部陈金土任厂长，马湘任副厂长。并县后，将从化印刷厂收归报社管辖，增加设备和人员，可以印刷日报。一九五九年，报社派吴诗龙同志到《井冈山报》和《南方日报社》学习制电版，回来办

小电版厂。至此，报纸印刷条件已具规模，除了保证报纸天天出版外，还包印全县各机关单位所需铅印品。

这张县报在当时所起的作用，主要有如下几点：

一是有力地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，对全县人民进行宣传教育，为党的各项工作运动鸣锣开道，保证运动顺利开展。如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，宣传党的“八大”精神，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开展农业生产高潮和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，报纸都是紧跟县委部署，进行宣传。重大事情则发表社论或连续性评论，大造舆论，制造气氛，鼓舞斗志。当运动开展起来之后，及时报道先进经验，宣扬先进人物，使运动能健康地、顺利地发展起来。

二是根据全县人口九成以上是农民、国民经济收入主要是农业这个特点，报纸以很大编幅宣传农业生产，协助党委指导农业生产运动的开展，特别是总结交流农业生产的经验，如农业技术改革，推广优良品种，抓紧季节不误农时，适时施肥，精耕细作和除治病虫害等先进技术和经验，这对促进农业科学实验，提高

农作物产量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农民读者反映说：“农民报是我们的良师益友，是农业技术顾问。”

三是报纸运用本地具体人具体事，用活生生的事实，对农民进行回忆对比和忆苦思甜教育，启发农民热爱共产党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。同时通过表彰先进人物，宣扬新人新事新风尚，教育农民确立社会主义新思想，都起到良好的效果。那时，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、听党的话，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，拥护粮食统购统销，热情交爱国公粮和卖爱国余粮等，出现许多动人景象。人们在报纸上看到先进人物的形象，取得学习的榜样，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之风遍及农村每个角落，这是报纸宣传的威力。

报上还出现许多重要新闻报道和价值较高的文章，如一九五九年报道周恩来总理、邓颖超大姐莅临视察的报道和一组照片，被收藏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，一九七七年在全国各地展出“周恩来同志生平事迹展览会”上，有我们这一组照片展出。此外，在广东省委举办的报刊展览会上，有三篇评论性文章被选入，作为写得好的典型范文介绍展出。我们报

纸的合订本，被北京图书馆、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分别收藏。

回顾办报四年多来，也存在不少问题和缺点，其中较突出的，是“大跃进”时期的浮夸风，也反映到报纸版面上来，刊登了报高产不够实事求是的报道，另外，限于当时主、客观的各种原因，报纸的基本内容是报道生产，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少报道，这也是《佛冈农民报》的一个缺点。

一九六〇年，因为纸张供应十分困难，各地县报只好停刊，《从化日报》也于十二月宣告终刊。

1985年11月5日

附：《佛冈农民报》创刊号及征订广告

浮云游子意 沧桑话乡情

——龙溪人在港生活小记

黄敬文

佛冈人一谈到在香港生活的历史情况，很自然便想到石角区龙溪乡。说那里有不少人在香港谋生，世代寄居在那里。据现在能查到的资料，黄耀星的祖父黄锦琼是最早去香港谋生的。时间是民国元年。龙溪人所以要由山乡远涉海外，主要是乡间穷困，生活困难，想另找出路，谋求一个能靠劳动，自食其力的工作。黄锦琼到了香港后，也没有找到工作。只好到垃圾堆捡些破烂，上住宅区收买烂铜烂铁来维持一日两餐，住的是包租婆走廊里碌架床的一个床位。直至他的儿子黄德威（大家习惯叫他“盲仔威”），先是在鸡鸭栏打工，后来才在九龙油麻地炮台街街市开了一间“泰和鸡鸭栏”。黄耀星的母亲胡阿四（南雄人），是

一个精明能干，会说、会算，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妇女，所以“泰和鸡鸭栏”的经济大权由她主宰。她经常回龙溪，宣传香港生活情况。乡人常为她说话所动，加上乡间也实在难以生活，所以有的乡人倒也愿意随她到香港谋生。胡阿四也乐意尽力协助帮忙。由于她乐于助人，她在龙溪人的心目中是颇有威望的。到香港谋生的龙溪人，大部分都住在炮台街胡阿四的住家，或在“泰和鸡鸭栏”当店员。以后，在港的龙溪人有什么喜丧事，都由黄德威家筹备。“泰和鸡鸭栏”和黄德威在炮台街的住家，在当时是起到龙溪、石角在香港同乡会的作用的。例如，我父亲黄北贤和黄亚虾的父亲就是胡阿四回乡后带去香港的。那年，我父亲才二十岁左右。到港后，开始在“泰和鸡鸭栏”打工。五年后，父亲经别人介绍和胡阿四的撮合，特别是资助，和一个在香港的姑娘叶秀娴结了婚。婚后两年，我出世了。后来我母亲没事做，便作了胡阿四家的保姆。母亲主要是负责带胡阿四大婆的孩子黄振星和黄秀英。因为我和黄耀星兄妹年岁差异不很大，常来常往，常玩在一起，青梅竹马，至今印象还较清

新。黄耀星后来参加人民解放军，如今还在新疆和静农二师二十三团工作，而黄秀英在香港沦陷时曾回龙溪生活，和平后再度出港。

龙溪人在香港，除了开鸡鸭栏或在这个行业打工外，一部分则做剥旧轮胎生意。当然也有做苦力的。女的没什么工作做，则做小贩或手工缝衣之类的工作。所谓轮胎生意，就是修补旧车轮，然后再卖出；或把旧车辘外胎收到手，经过批削，按需要作成皮鞋底、胶辘草鞋（俗称“千里马”；当时山区体力劳动者常用的一种简便鞋）或作其它用途。三、四十年代龙溪人做这种生意为最盛。做这类生意，数龙溪下围人多一些，如，黄求安就是，当然大围人也有。除此，还有做咸鱼栏、走船、车衣的，象龙溪大围黄锡章就做这类生意。

黄锡章十六岁去香港。按他出身年龄计算，如果活着，今年该是九十二岁了。但他已于一九八二年去世。生年八十八岁。生前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，曾多次回家乡省亲。

黄锡章在香港，一向从事正规行业。当年从家乡到香港，开初就在新界长洲中华百货公司做炊事员。因为他工作积极，任劳任怨，颇

搏得老板的信任，接着便做买手兼外柜（即抓门面收入）。他在这间百货公司，真可谓兢兢业业了。一直由正式开张，做到该公司倒闭。

黄锡章的妻子是水上人（名字记不起了）。妻子外家在长洲，有渔船三艘。由于黄锡章社交活跃，借助妻子的关系，逐渐结识了不少水上人。开始是自己出海捕鱼卖入鱼栏，后来因为黄锡章为人精灵，颇得人缘，很快就做了鱼商经纪。尔后，还做过小布匹店的老板兼车衣和经营手饰金银。总之，此人生活行档熟悉，无什么很正规的行业。香港沦陷时，一家九口生活奔波、穷困，经济拮据。现有几个儿子都有了工作。大儿子振雄在华南游泳场工作，二儿子在邮局工作，三儿子振华则在学校教书。都成了家，枝繁叶茂了。

在港认真创业的龙溪人，早期是黄德威，中期有黄苏，现在有黄培。黄培由于亲自主持业务，既当老板，又管业务和推销，兼做工人，加上没有什么坏习惯，所以颇能创业。现在在港经营五金生意。失败的事例，算是黄北胜的哥哥（胜仔），即现在黄锡潮的父亲。和平后，他本来在九龙开了一间轮胎店，颇有一

些收入，故家庭生活还不错。可是，后来染上吸毒行为，弄到妻儿住在街边，过着象乞丐般的生活。幸好后期儿女长大，渐渐生活才有了好转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六时，港方树起了白旗，日寇先头部队已到香港酒店，香港终于沦陷了。

香港沦陷后的龙溪人和香港同胞一样，都要经历三关：即粜米、灯火管制、制水。

所谓粜米，就是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香港政局不稳，不足以应付突然到来的战争造成的一切紧张局势；所以粮食问题，竟表现得突然严重起来。港政府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，是对贫民施饭，对中下阶级售平粜米，每人一元或十元的米，价格维持战前水平。由于平粜站办得太少，购买不易，于是助长了黑市米。许多游民为图营利也挤到等候购米的行列中，以期购到一元的米可以卖到三元至四元，而不是为了自己食用。到了香港沦陷，日寇每天只供给每人六两四钱米，所以当时香港同胞都受到饥饿的威胁，许多人饿死了，龙溪人也无例外。考虑缜密的，就携儿带女回到乡下，有

些则在东江一带做“走水客”（即类似现在的“走圩”生意，多以在各地贩买旧衣服为主），维持简单的生活。

所谓“灯火管制”，即为了不使灯光向日寇暴露，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起，灯光已和一般市民告别了。黄昏一过，全港一片漆黑，街上静得象一个死市。这对于做小贩的龙溪人来说，带来生活不便先不说，就是做生意也是一桩难事了。

至于“制水恐慌”，就是人们担心蓄水塘被炸，水源断绝，海水不能吃，人不能一天没有淡水，将怎样生活，市民们忧心忡忡，觉得为了水也许会使秩序大乱。香港同胞这时的思想，都考虑怎样设法离开这个“死港”。

这“三关”，有些龙溪人闯过了。所谓闯过，无非就是带着妻儿子女离开香港回内地。不取此策，龙溪人流在香港的，多数不是家散人亡，就是给活活饿死了。例如，我父亲黄北贤一家便是由于没有及时离开香港回龙溪，致使家散人亡，侥幸活下来的，也无法团聚。

一九四一年前后，我父亲一家已经由过去给“泰和鸡鸭栏”当店员转而成为茶楼、酒家、

鸡鹅鸭的经纪商了。从经济收入来看，比替人打工，收入增多了，银行也颇有存款。香港沦陷后，银行存款冻结，只有靠手头少许现款维持生活，也做些粥食小贩，例如卖及第粥，炸咸煎饼之类。收入甚微。后来日本仔修建启德飞机场，父母亲还去做过泥工。一家八口，每人每天六两四钱米，加上经济拮据，父母亲常因此发生争吵、不和。为了子女，常常把粥饭让了出来，他们自己则吃蕃薯藤或“薯达菜”煮粥。劳动辛劳，思想焦虑，营养不良，父亲的手脚、脸部开始露出浮肿现象。考虑到自己的处境，他曾暗下决心把一家大小带回老家龙溪，渡过难关，然后再图出港。这个打算，得到在港的龙溪人赞同。在纷纷有龙溪人回内地的日子里，不时有人来相约，结伴回乡。有一天，振源兄来邀父亲同回龙溪。父亲思想已准备就绪，约定第二天一家和振源兄同回龙溪。这天下午，父母亲专程跑到九龙黄大仙求了一枝签。签的内容不主张合家回家，加上母亲从小在港长大，父母兄妹也都在港，过不惯乡间生活，回家乡的打算父亲执拗不过母亲，遂断然取消决定。从这件事以